

共同富裕：理论脉络、主要难题及现实路径

罗明忠¹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 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 其内涵不断丰富。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定不移地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 进入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求相比, 现阶段我国在收入分配、发展机会、公共服务、精神文明等方面还存有短板。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应贯彻新发展理念,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通过赋权、强能、并轨与融合, 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共同富裕 高质量发展 路径选择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与行动指南。共同富裕具有普遍性, 是人类共同心愿及其追求的发展目标。但由于各国在资源禀赋、地理及文化上具有差异性, 其共同富裕的特定目标存在较大不同。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立以来, 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实现共同富裕, 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 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当然, 中国要走的共同富裕道路是渐进式富裕道路,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会经历从部分到整体的过程, 需要分步骤、有秩序推进。而且, 共同富裕并非一种静态结果, 而是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其具体内涵和标准会随时间、空间发生变化, 且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密切相关¹。为此, 本文从动态发展视角, 梳理共同富裕的理论脉络与中国实践, 剖析现阶段中国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难题, 进一步明确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可行路径, 以期为推进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助力。

一、共同富裕的理论脉络与中国实践

(一) 共同富裕的理论发展脉络

在中国, 共同富裕的追求古而有之, 不论是《论语》中“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 亦或是《韩非子》中“论其赋税以均贫富”均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共富”理念。

在西方社会, 发展与分配是久盛不衰的主题, 早在 18 世纪 70 年代, 亚当·斯密就系统地阐述了经济增长与分配问题。此后, 西方经济学家, 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产生前, 以欧文、圣西门以及傅立叶等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通过揭露私有制社会的种种弊端, 构想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理想社会。例如, 欧文痛斥“私有财产是贫困的唯一根源, 由于贫困而在全世界引起各种无法计算的罪行和灾难, 它在原则上是那样不合乎正义, 如同它在实践上不合乎理性一样”²,

¹作者简介: 罗明忠, 男,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²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民工返乡创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模式与路径优化研究”(项目编号: 20BJY141);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会化服务视角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融合: 作用机理与路径”(项目编号: 2020A1515011202)

尝试设计“公社制度”；圣西门指出应当“使大多数无产者拥有财产”，构想以成果共享为目标的“实业制度”，认为“实业阶级是供养整个社会的基本阶级，没有这个阶级，其它任何阶级都不可能生存下去”³；傅立叶在阐述雇佣工人贫困极弱的处境时指出，“他们远比那在自然状态下享受可能得到的幸福的蒙昧人，实在要可怜得多”⁴，虚构了“和谐制度”。尽管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为未来社会设计了美好蓝图，但由于其理论本质缺乏社会基础和实现路径，最终使他们心中的共同富裕成为“黄粱一梦”，沦为空谈。

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⁵，使共同富裕理论开始从空想向科学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首先，坚持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和剥削，必然会导致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在财富上的两极分化，也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只有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才能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其次，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条件。共同富裕离不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保障。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⁶。最后，消除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资产阶级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攫取无产阶级的劳动剩余价值，进而导致其陷入贫困陷阱，使得贫困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解决贫困问题是共同富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当然，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渐进性特征，难以一蹴而就，在社会主义初期，人们会存在消费资料分配和占有上的区别。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⁷

列宁和斯大林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理论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首先，理清了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将共同富裕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列宁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可以在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条件下实现富足。其次，明确了发展生产是共同富裕的基础保障。斯大林认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基石，能使所有劳动者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最后，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列宁指出：“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所准备起来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⁸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自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共同富裕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⁹。并且，毛泽东首次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该报告明确指出：“实行合作化，……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¹⁰。这一时期共同富裕思想集中体现为“共有共管，共劳共富”。邓小平将共同富裕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1992年春天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¹¹，创造性地提出“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方法论。江泽民指出“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¹²。胡锦涛强调要“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¹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共同富裕这一重要理论命题作出深刻阐释，透彻阐明了促进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问题，彰显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智慧。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¹⁴习近平还对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及其实现路径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的论述，明确指出，促进共同富裕，要把握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和坚持循序渐进四大原则；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¹⁴。

可见，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富裕理论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

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

(二)共同富裕的中国百年实践历程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践行初心使命，追求共同富裕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建党百年来，共同富裕的实践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秉持着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探寻

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得到了早期先进分子的肯定和接受，深化了该群体对共同富裕的认知。陈独秀在创办《青年杂志》时就曾提出，财产私有制会造成贫富差距过大，并非社会之福¹⁵。1921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进行马克思主义宣讲时，也明确指出，人人获得平均化供给才是最大的幸福¹⁶。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意识到要破解人民群众积贫积弱的困境，走向共同富裕道路，必须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当时，农民是全部人口中最大的群体，而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要带领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必须首先解决土地分配不公问题。因此，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相关土地制度，如《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临时土地政纲》等政策文件¹⁶。“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没收地主土地”等一系列不同阶段的土地政策措施，有效解决了由于土地分配不均导致的农民贫苦问题，开启了以土地革命推动共同富裕的新篇章。与此同时，为保障军队供给、减轻群众负担、改善解放区经济状况，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唱响了诸如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陕北好江南”的美好赞歌。可见，这一时期的共同富裕推进历程，主要从所有制变革出发，通过发展解放区的红色经济，带领群众自力更生、摆脱贫困，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在解放区付诸实践。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艰辛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并从生产关系入手思考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他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¹⁷1953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提出，要使农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应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¹⁸。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政治基础。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经验不足，建立和巩固共同富裕基本制度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地推行公有制，逐渐取消私有制，期望以此消除贫富差距，寻求平均主义下的同步富裕。具体做法包括：一是主张公有制为单一所有制形式；二是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严格的财政预算制度，并采取统购统销的资源分配方式；三是制定平均主义下的分配原则，取消收入差别。这些做法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尽匹配，产生了一些问题，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强国富民的理想不容置疑，也始终未变。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跨越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总结先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思想进行了新的发展，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摒弃平均主义思想。邓小平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重新思考后，创造性地提出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思路，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¹⁹。具体实施路径包括两种：一是对农业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农业改革带动城市的改革。二是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并逐渐向内陆转移，形成由沿海到内陆的开放格局。整体而言，这一探索阶段更加注重效率，经济发

展速度不断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得到了显著提升，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也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逐步显现等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²⁰。此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强调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兼顾公平。但“兼顾公平”并未取得完全的预期效果，2000 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警戒线，贫富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亟待解决。党的十六大报告聚焦于收入分配，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公平的地位第一次被放置于效率之上，明确了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²¹，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决心，也体现了公平对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对共同富裕道路作了新的探索，对共同富裕目标作了新的部署。尤其是在 2020 年底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彪炳史册，创造了中国经验，世界奇迹。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面对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处在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突破百万亿元、一万美元大关，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为迈向共同富裕打下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工作，中国共产党在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贫困和低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保障人群，中国共产党采取超常举措，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组织实施和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

共同富裕既包括物质生活的富裕，又包括精神生活的富裕。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

共同富裕道路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呈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可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富裕实践的内涵不再局限于物质维度，而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的全面共同富裕。物质生活的富裕是基础，社会维度要求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服务，全方位改善人民生活；文化维度的主要表征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生态维度主要表现为优化人民群众的居住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当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开启了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征程。

二、共同富裕的主要难题与挑战

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带领全体人民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繁荣稳定的世界奇迹，为迈向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和社会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在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诸多挑

战。

(一)收入分配差距需进一步缩小

当前，中国贫富差距问题较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城乡居民间、地区间和行业间收入差距较为明显²²，收入分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2018年前后，134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排名中，中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²³。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56，虽然相比2019年有所下降，但绝对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分配制度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其中，初次分配是根本，再分配是关键，三次分配是补充²⁴。

首先，初次分配中的要素分配机制不尽完善，导致劳动报酬占比较低，企业和居民间收入分配不完全合理。其次，再分配的调节机制较为有限。一是税收的再分配机制不尽完善，平均有效税率较低导致个税的收入再分配功能较弱²⁵；对于高收入群体的税种设计不尽完善，缺少针对其财产的税收制度。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尽完善。目前社会保障范围有限，群体间保障标准差距较大，保障待遇与缴费基数密切关联，难以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收入调节作用。三是最低转移支付制度有待完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偏低，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如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补贴标准有待提高，同时在个别地方尚未达到“应保尽保”的制度目标。四是收入分配秩序不够规范。一些垄断部门仍然存在不合理的过高收入，加大了收入分配不公程度，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放大。最后，三次分配的激励机制尚未健全。民间慈善、志愿活动等社会慈善行为的制度保障体系尚不完备，高收入群体参与慈善的积极性不够，定位不清晰，同时在一些地方还存在慈善监管不力、公信力缺乏等现象。

(二)机会不均引致个体发展动力有待加强

机会不均等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等社会问题。尤其是参与和发展机会的不均等，会导致社会阶层进一步固化，降低社会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积极性和可能性，进一步扩大社会群体间的贫富差距，削弱底层群体的社会认同感，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当前，中国社会的机会不均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虽然义务教育已在全国普及，但教育资源在城乡、区域以及阶层间分配不均衡，教育质量差异较为明显，学生间的发展能力区别较大。比如，农村基础教育的人均教育经费只有城市的一半，教育设施投入不足，整体师资质量不高。部分特殊群体如残疾儿童的入学机制还有待完善。除了基础教育外，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平衡也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东部省份的教育资源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教育投入差距明显，进一步加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程度。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直接导致了个体发展能力和机会的差异不断增大，会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二是就业机会的不均等。由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非就业能力因素的限制，不同群体间的就业机会及城乡、地区、行业间工资待遇、社会福利存在较明显的差别，劳动力市场不规范和就业歧视问题仍然存在，公平竞争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相关法律法规也亟待完善。这些问题会挫伤劳动者的就业积极性，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水平尚待提高

目前，中国公共服务领域仍存在一些发展不平衡问题，就基层单位公共服务而言，还存在乡镇单位窗口与城市比服务有差距、中心与外围区域的窗口服务质量有差距、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窗口服务能力有差距以及是否进入服务大厅整体服务质量有差距等“四大差距”。尤其是城乡间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差异较为明显，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总体相对偏低，包括就业服务、教育和医疗服务、养老和住房保障服务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各个方面。具体而言，在就业服务方面，城乡投入差别较大，一些农村地区尚未建立规范的、专业的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和人才服务体系。目前，针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服务在一些地区还或多或少存在形式大于内容、与实际需求脱钩等问题，同时对这类培训服务缺乏有效的评估和监管，导致培训的有效性不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难以得到明显有效提升。

教育是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抓手。教育能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能力保障、技术保障和就业保障，增强人力资本，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畅通阶层上升通道，防止阶层固化，阻隔贫困代际传递。但是，在基础教育方面，城乡之间无论是师资力量等软条件，还是教学设施等硬条件都存在差距。随着农村人口向外转移，农村适龄儿童逐渐较少，农村教师人才队伍仍在流失，部分留守农村的学龄儿童的义务教育质量难以切实保证，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教育差距程度。同样地，由于户籍、住房等方面的限制，一些与务工父母辈随迁的农村子女仍然面临着上学难的问题。在基础医疗服务方面，城乡间医疗资源差距较为明显。2019年，城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是农村的2.2倍。不同群体间医疗待遇差别较大，2019年全国城镇职工的医保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为75.6%，而城乡居民为59.7%，相差15.9个百分点²⁶。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医疗服务过度与医疗服务不足同时存在，医疗资源存在分配不均等，低收入群体和流动群体的医疗保障水平低于平均水平。

在社会保障方面，基于低水平、保基本、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中国社会保障的总体保障水平依然有待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待遇差别较为明显，标准不一致。随着老龄化逐渐加重，养老保障水平难以完全匹配养老需求，养老服务供给不足问题显现，特别是农村养老服务将面临新的挑战。部分养老机构所提供的养老服务与老龄化人口实际需求脱节，服务质量良莠不齐。同时，目前的社区养老体系尚未完善，服务内容较少，服务质量较低，也无法完全满足当前的养老需求。在住房保障方面，大量流入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的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以及农民工群体都面临着住房困难等问题。现有的保障性住房难以完全满足庞大的住房需求，相关住房配套措施也有待完善，降低了流动群体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

(四) 精神文明建设体系尚不完备

共同富裕的内涵从单一物质维度，向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维度拓展。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目前，精神文明建设体系尚不完善，内容不够丰富。一方面，理想信念教育机制并未完全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常态化教育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尤其是针对农村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机制不够健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正能量宣传方面尚未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优势，资金、人员、技术等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存有短板。部分地区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和支持力度不够、创新性不足，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待提高。文化产品配置过于集中，导致文化资源分配不均，城乡、区域间文化服务质量差别明显。农村文化设施和文化产品供给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农村居民未能充分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文化服务。针对儿童、青少年、老年人以及残疾人等群体的文化服务体系有待健全，供给不足。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管理机制不健全，一些建设完成的文化场地由于管理服务不到位、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步伐滞后等原因，存在利用率低下等问题，造成资金浪费，不利于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²⁷。没有高质量发展作为支撑，共同富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在发展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建立健全更加公平的利益共享机制，确保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应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优化发展结构，提升发展质量，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一) 赋权：推动分配制度创新

制度是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新时代，共同富裕应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和活力。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原有依赖于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逐渐难以适应现有的经济现实，需要进行改革。而这一过程的关键点在于发展动能的转换。制度创新是建立高质量经济体系和生产力的动力来源。当然，制度创新不仅能够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保驾护航，促进生产效率提升，为共同富裕实现提供物质保障，而且在解决财富分配、人口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也具有独特作用。只有不同领域、不同维度的制度创新共同发力，才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习近平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

排。”²⁷一方面，要持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一是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契机，破除阻碍收入分配公平的各类体制机制，解决内部的社会利益失衡问题，防范外部环境不稳定带来的分配公平风险。二是以收入分配公平为主线，建立各类要素平等参与的分配体系，优化初次分配中的工资增长机制和报酬支付机制，完善再次分配中的税收、转移支付机制，重视三次分配中的慈善捐赠机制。调节过高收入、取缔违法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目标。另一方面，逐步清除阻碍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和区域发展政策，减少由户籍制度和区域发展政策造成的收入、资源等分配不公现象，助力收入分配公平和贫富差距缩小。

（二）强能：构筑共享发展通道

明确发展是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问题。推进共同富裕应将共享发展作为根本宗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发展环境。首先，就发展对象而言，共享发展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个维度，要以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发展的主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次，就发展方式而言，要以共建为前提、共享为结果，通过共建共享的方式推进共同富裕，形成先富带动后富、先富帮助后富的共同富裕实现机制。最后，就发展过程而言，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是渐进富裕，共享发展将经历由低级到高级、不平衡到平衡的转变过程，要不断优化发展结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共同富裕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全体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

原有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注重基础教育。而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教育投入的重点发生了转移，开始逐渐向职业教育和大众教育转变。新时代，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使得劳动者需要不断学习，增强自身的专业技能和就业能力，以适应新的岗位要求。相比于教育投入，更应该关注教育资源均衡化问题，这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将教育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倾斜，为其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补齐教育短板，促进教育资源均等化。通过改善乡村学校的教学条件、生活条件，扩大乡村教师队伍，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以教学信息化、数字化带动乡村教育的现代化等手段，提升乡村教育质量。二要加快建立并完善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在当地接受教育的政策支持体系，推动教育资源在不同群体中的均等化配置，构筑公平的发展通道，避免个体发展动力不足等社会问题，通过教育强能助力共同富裕。

（三）并轨：建立协调发展机制

区域、城乡等发展不平衡阻碍共同富裕实现，应当将协调发展的理念融入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充分发挥先富带后富作用。一方面，构建统筹有力、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鼓励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发挥经济发展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通过东西协作、南北互通等方式，释放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潜力。进一步完善区域合作目标规划和政策支持体系，深化对口协作帮扶机制，拓展协作帮扶范围，优化协作帮扶方式，在产业、人才、资源、技术等全领域实现协调发展，全面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能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建立协调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缩小城乡、区域、人群的社会保障差距。加强社会保障的调节力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确保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优化社会保障制度，提升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待遇，破解收入越高保障越充分的“逆向保障”问题。加大对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充分保证劳动者的就业权益。切实提升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共济互助机制。健全社会救助新体系，缩小城乡救助标准差距，逐步消除户籍等外在因素导致的救助差异，推动建立常住地社会救助申领机制，使居民更便捷、更公平地获得救助，最大程度提升居民安全感。

（四）融合：建设精神文明家园

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上的富裕、经济上的富裕，更是精神上的、文化上的富裕。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夯实，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加，在质和量上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²⁸。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更加丰富，要保障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避免走入“物质富裕单行”的误区。

首先,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增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人民内心,并外化于行。同时,积极宣传时代楷模、道德模范的伟大贡献和感人事迹。在全社会营造尊崇榜样、学习榜样、爱护榜样的良好风气,坚持用先进榜样感召、激励、带动人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培育知荣辱、讲正气、肯奉献、促和谐的社会风尚,共创精神文明家园。其次,充分发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作用,为不同层次、年龄等群体提供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和情感需求。同时,积极开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工程,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和转化,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素养。最后,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高质量、高效率、公平化和可持续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现街道、社区、乡村等基层互联互通的协同化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完善乡村的文化基础设施,立足乡村特点,打造接地气、有品位的乡村文化空间,补足乡村文化建设短板,满足广大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和文化需求。同时,坚持创新公共文化产品服务形式,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多渠道、多举措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供应,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建设,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高效、便捷等优势,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质和效能。

注释:

1 罗明忠、邱海兰:《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9月23日。

2(1)《欧文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页。

3(2)《圣西门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9页。

4(3)《傅立叶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3页。

5(4)邱海平:《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7期。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6—787页。

7(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页。

8(7)《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版,第193页。

9(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

10(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页。

11(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2(11)《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

13(12)《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4页。

14(13)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15(14)陈独秀:《独秀文存》,亚东图书馆1927版,第12页。

16(15) 秦川：《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李大钊》，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版，第 230 页。

17(16)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99 页。

18(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版，第 215 页。

19(18)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91 页。

20(19)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 页。

21(20)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版，第 30 页。

22(21) 罗明忠、邱海兰：《收入分配视域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思路与路径选择》，《求索》2021 年第 2 期。

23(22) 张来明、李建伟：《促进共同富裕的内涵、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改革》2021 年第 9 期。

24(23) 李海舰、杜爽：《推进共同富裕若干问题探析》，《改革》2021 年第 11 期。

25(24) 张玄、岳希明、邵桂根：《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国际比较》，《国际税收》2020 年第 7 期。

26(25)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0 版。

27(26)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 年第 20 期。

28(27)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 年第 20 期。